

六朝建康的水陆交通

——读《宋书·州郡志》札记之二

何 德 章

先秦两汉,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于长江流域,秦汉统一政权针对军事行动、政治控制、财富转运而进行的水陆交通建设,亦主要围绕统一国家都城长安(咸阳)与洛阳展开,与黄河流域交通建设相比,秦汉时期在南方进行的交通建设非常有限,可数者惟秦开灵渠、汉凿峽道数事而已。《史记·货殖列传》称:“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集解》引应劭曰:“堇,少也。更,偿也。言金少耳,取之不足用,顾费用也。”原司马迁之本意,并非是说物少,而是相对于汉都长安,地方偏远,交通不便,物产虽丰,开采不易。六朝都于建康,在江南腹地广设行政机构,随着各地郡县行政机构设置,当地对外交通自然会逐步发展起来。《宋书》4卷《州郡志》列有各州到建康的水陆路程,以及各州下属郡县至州治、至京城建康的水陆路程,应是当时官方“驿道”里程的记录^①。大致反映了刘宋后期统治下的各州内部的交通状况,以及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方水陆交通网络情况。兹撷取列表如下,以便分析。

州郡名	治所今地	距建康水程	距建康陆程
扬州	南京		
会稽	浙江绍兴	去京都一千三百五十五	同水程
吴郡	江苏苏州	去京都六百七十	五百二十
吴兴	江苏湖州	去京都九百五十	五百七十
淮南	安徽当涂南	去京都一百七十	一百四十
宣城	安徽宣城	去京都五百八十	五百
东阳	浙江金华	去京都一千七百	同水程
临海	浙江宁海	去京都二千一十九	同水程
永嘉	浙江温州	去京都二千八百	二千六百四十
新安	浙江歙县	去京都一千八百六十	一千八百
南徐州		去京都二百四十	二百
南琅邪	南京东	去州二百	一百
晋陵	江苏常州	去州一百七十五 去京都四百	同水程
义兴	江苏宜兴	去州四百, 去都四百九十	同水程

续表

州郡名	治所今地	距建康水程	距建康陆程
徐州	江苏徐州	去京都一千三百六十	一千
沛郡	江苏沛县		去州六十,去京都一千
下邳	江苏宿迁境	去州二百 去京都一千一百六十	去州一百八十 去京都八百
兰陵	山东枣庄北	去京都一千六百	去京都一千三百
东海		去州一千 去京都一千	去州八百 去京都六百七十
东莞	山东莒县	去京都二千	去州七百 去京都一千四百
东安	山东沂水		去州七百 去京都一千三百
琅邪	山东临沂	去京都一千五百	去州四百 去京都一千一百
淮阳	江苏淮安西北	去州六百 去京都七百	去州五百 去京都五百五十
钟离	安徽蚌埠	去京都一千三十	去京六百二十
马头	安徽蒙城	去京都一千七百五十	去京都六百七十
南兖州	江苏扬州	去京都二百五十	去京都一百八十
海陵	江苏泰州	去京都三百九十	同水程
山阳		去州三百 去京三百九十	同水程
盱眙	江苏盱眙	去州四百九十 去京七百	去州二百九(十) 去京五百
秦郡	江苏扬州西	去州二百四十一 去京一百五十	去州一百八十 去京一百四十
兖州			
泰山	山东泰安		去州八百 去京一千八百
鲁郡	山东曲阜		去州三百五十 去京都一千一百
东平	山东东平	去州五百 去京二千	去州与同 去京一千四百
济北	山东东阿	去京二千	去州七百 去京一千五百
南豫州	安徽当涂	去京一百六十	
南谯	安徽巢县	去州五百四十 去京七百	去州一百七十 去京五百
庐江	安徽舒城	去州二千七百四十 去京一千一百	去州四百七十 去京六百三十
南汝阴	安徽合肥	去京一千	去州三百 去京五百三十

续表

州郡名	治所今地	距建康水程	距建康陆程
南梁		去州一千八百 去京一千七百	去州五百 去京七百
晋熙		去州无 去京一千二百	去州八百 去京无
弋阳	河南潢川	去京都(阙里程)	去州一千一百
豫州			
汝南	河南息县	去州一千 去京三千	去州七百 去京三千
新蔡	河南新蔡	去京二千五百	去州六百 去京一千四百
谯郡	安徽亳州	去京二千	去州三百五十 去京一千二百
梁郡	安徽寿县西	去京九百	去州一百六十
陈郡	河南沈丘	去京一千四百五十	去州七百六十
南顿	河南项城		去州七百六十 去京一千四百五十
汝阳	河南周口境	去京三千五百	去州二百 去京一千四百
江州		去京一千四百	
豫章	江西南昌	去州六百 去京一千九百	去州三百五十 去京二千一百
鄱阳	江西波阳	去州四百四十 去京一千八百四十	去京二千六十
临川	江西南城	去州一千一百 去京二千八百三十	去州一千二十 去京三千
庐陵	江西赣州	去州二千 去京三千六百	去州一千六百
安成	江西安福	去州三千三百 去京三千七百	去州三千六百 去京无陆
南新蔡	江苏九江西	去州二百 去京一千三百七十	去京一千八百八十
建安	福建建瓯	去州二千三百八十 去京三千四十	去州、京并无陆
晋安	福建福州	去州三千九百九十 去京三千五百八十	
青州	山东益都		去京二千
济南	山东济南		去州四百 去京二千四百
乐安	山东广饶		去州一百八十 去京一千八百
高密	山东诸城		去州二百 去京一千六百

续表

州郡名	治所今地	距建康水程	距建康陆程
平昌	山东安丘境		去州二百 去京一千七百
东莱	山东掖县		去州五百 去京一千八百
长广	山东平度		去州五百 去京一千九百五十
冀州(历城)	山东济南		去京二千四百
清河			去州一百一十 去京一千八百
乐陵			去州一百四十 去京一千八百
司州(义阳)		去京二千七百	去京一千七百
安		去京二千三百	
荆州(江陵)		去京三千三百八十	
南平	湖北公安境	去州二百五十 去京三千五百	无陆
天门	湖南石门	去州一千二百 去京三千五百	去州六百
宜都	湖北宜都	去州三百五十 去京三千七百三十	无陆
巴东	重庆奉节	去州一千三百 去京四千六百八十	
汶阳	湖北远安	去州七百 去京四千一百	去州四百
南河东	湖北枝江	去州一百二十 去京三千五百	
建平	重庆巫山	去州一千 去京四千三百八十	去州一千
永宁		去京三千四百三十	去州六十
郢州		去京二千一百	
竟陵	湖北钟祥	去州一千四百 去京三千四百	
武陵	湖南常德	去州一千 去京三千	
巴陵	湖南岳阳	去州五百 去京二千五百	
武昌	湖北鄂城	去京一千一百	
西阳	湖北黄冈	去州二百八十 去京一千七百二十	
湘州(长沙)		去京三千三百	
衡阳	湖南衡山	去州二百二十 去京三千七百	

续表

州郡名	治所今地	距建康水程	距建康陆程
桂阳	湖南郴州	去州一千四百 去京四千九百四十	
零陵	湖南零陵	去州一千四百 去京四千八百	
营阳	湖南道县	去州一千七百一 去京五千五百五十	
湘东	湖南衡阳	去州七百 去京三千六百	去州七百
邵陵	湖南邵阳	去州七百 去京四千五百	
广兴	广东韶关	去州二千三百九十 去京五千	
临庆	广西贺县	去州二千八百 去京五千五百七十	去州、京陆程与水同
始建	广西桂林	去州二千八十 去京五千五百九十	
雍州	湖北襄阳	去京四千四百	去京二千一百
南阳	河南南阳	去京四千四百	去州三百六十
新野	河南新野	去州一百八十	去京四千五百八十
梁州	陕西汉中		
魏兴	陕西安康	去州一千二百 去京六千七百	
新城	湖北房县	去京五千三百	去州一千五百
上庸	湖北竹山	去京六千七百	去州二千三百
晋寿	四川广元南	去京一万	去州一千四百
宋熙	四川旺苍	去京九千八百	去州七百
益州		四川成都	去京九千九百七十
广汉	四川广汉	去京九千九百	去州六百
巴郡	重庆市	去京六千	
汶山	四川灌县	去京一万	去州一百
犍为	四川彭山	去京一万	去州九十
晋原	四川成都西北	去京一万	去州一百二十
东江阳	四川纳溪	去京八千九十	去州一千五百八十
宁州	云南曲靖	去京一万三千七百	
晋宁	云南晋宁	去京一万三千七百	去州七百三十
牂牁	贵州贵阳东北	去京一万二千	去州一千五百
平蛮	贵州毕节境	去京一万三千	去州一千五百
夜郎	贵州关岭境	去京一万四千	去州一千
朱提	云南昭通	去京一万四千六百	去州七百二十
南广	云南盐津境	去州二千三百 去京一万四百	

续表

州郡名	治所今地	距建康水程	距建康陆程
建都	云南武定境	去京一万五千	去州二千
西平	广西西宁境	去京一万五千三百	去州二千三百
西河阳	云南云龙境	去京一万五千五百	去州二千五百
东河阳	云南下关境	去京一万五千	去州二千
云南	云南丽江境	去京一万四千五百	去州一千五百
兴宁	云南罗平境	去京一万六千	去州二千三百
广 州	广东广州	去京五千二百	
苍梧	广西梧州	去州八百 去京五千五百九十	
晋康	广东德庆境	去州五百 去京五千八百	
新宁	广东肇庆境	去州五百 去京五千八百	
永平	广西藤县境	去州一千二百 去京五千四百	
郁林	广西桂平境	去州一千六百 去京七千九百	
桂林	广西柳州境	去州一千五百七十五 去京六千八百	
高凉	广东阳江	去州一千一百 去京六千六百	
新会	广东江门		去州三百五十
东官	广东东莞	去州三百七十 去京五千六百七十	
义安	广东潮州境	去州三千五百 去京八千九百	
宋康	广东阳江境	去州九百五十 去京五千九百七十	
海昌	广东高州境	去州六百五十 去京五千四百九十四	
宋熙	广东肇庆境	去州三百四十五 去京五千二百	
交 州	越南龙编	去京一万	
九真	越南清化	去州八百 去京一万一百八	
九德	越南荣市	去州九百 去京一万九百	
日南	越南横山	去州二千四百 去京一万六千九十	
越 州	广西合浦境	去京一万八百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标明的各州郡今地,不少只是大致情形,东晋南朝,在今河南、山东地区的统治区域变化不定,江淮地区的侨州郡更为复杂,一些行政机构的具体位置甚至当时管理

版图的官员也不一定说得清楚,我们更难弄得十分准确^②。同时,表中所列水陆路程,由于传写错谬,有的肯定不准确^③。但这些记录还是反映了六朝交通发展的一些特征。

1. 以水路为主的交通网及其缺陷

六朝交通以水路为主,这是南方地理条件决定的,长江、淮河、珠江及其支流构成了六朝交通的主干。除了当时山东半岛没有直接的水路通向建康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有水程记录,而湘江流域、今云、贵川三省、两广地区各州内部虽有陆路路程的记录,但从这些地方抵达建康基本上都以水路为主,所以《州郡志》根本没有这些地区各州郡至建康的陆程记录。

水运载重量大,耗废小,水路是南方最可利用的自然行成的交通线,但顺流而下与逆水行舟,情形大不相同。就长江干流沿线来说,六朝时,从建康到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由于水量充沛,船行无阻,公私上下行旅自然以水路为主。但沿江溯流,船行甚慢,可以想像。这一时期史料很少有关于行旅程程与相关时间的记录。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刘裕率军从建康出发至江陵讨刘毅,史书留下了准确的时间记录,弥足珍贵。《宋书》卷2《武帝纪中》说:“(义熙八年九月)壬午,发自京师。遣参军王镇恶、龙骧将军蒯恩前袭江陵。十月,镇恶克江陵,毅及党与皆伏诛。十一月己卯,公至江陵。”同书卷45《王镇恶传》说:

高祖谋讨刘毅,镇恶曰:“公若有事西楚,请赐给百舸为前驱。”义熙八年,……九月,大军西讨,转镇恶参军事,加振武将军。高祖至姑孰,遣镇恶率龙骧将军蒯恩百舸前发,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贼知吾上,比军至,亦当少日耳。政当岸上作军,未办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筹量,可击,便烧其船舰,且浮舸水侧,以待吾至。慰劳百姓,宣扬诏旨并赦文、及吾与卫军府文武书。罪止一人,其余一无所问。若贼都不知消息,未有备防,可袭便袭。今去,但云刘兗州上。”镇恶受命,便昼夜兼行,于鹊洲、寻阳、河口、巴陵守风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

大军征江陵,不仅王镇恶所统前锋为水军,刘裕必亦水道而往。义熙八年九月戊辰朔,壬午为农历九月十五,十一月丁卯朔,己卯为十三日。刘裕于九月十五日兵发建康,当月二十九日在姑孰(今安徽当涂),如无休停,用时14天,王镇恶从姑孰至江陵用时24天,其间待风信4天。从建康至江陵,王镇恶轻舸疾进,共用38天;刘裕中军持重,安流平进,用时58天。据《州郡志三》,江陵至建康水程3380里,王镇恶平均日行约90里,而刘裕日行约60里。90~60里应是当时从长江下游上溯一日行程的上下限,这相对于陆路交通来说,无疑较慢^④。

而这还只是长江中下游的情况,三吴各郡虽均有水路至建康,但经过人工贯通溪流、湖泊而形成的水道,往往需人、牛力牵引才能行使,遇旱无水,则断行旅。赣江为六朝达于岭南的重要水道,而“南康瀘石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者以为难”^⑤。鄱阳湖中风涛亦常阻行旅^⑥。《搜神记》卷11“葛祚碑”条说:“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斧斤,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立碑曰:‘正德祈祷,神木为移。’”撇开这一故事的神秘色彩,我们可以看到是当时人们对于湘江衡阳段加以整治以利航行的事实。

六朝从建康至成都水路,可由长江上溯至今重庆市转嘉陵江,在宕渠(今重庆合川)溯内江(即涪江)至巴西郡(治今四川绵阳)取陆路,或从重庆沿长江上溯至今四川泸州市,转溯中江(即今)沱江而至牛鞞(今四川简阳)上岸陆行,亦可从长江再上溯至犍为(治今四川宜宾市),转溯岷江直达^⑦。但峡江溯流,百丈牵引,非凭风信,建康至成都,行程万里^⑧,周年不达^⑨。因而北方政权稍一强盛,进图蜀地,建康政权鞭长莫及,可轻易得手。前秦夺取益州,东晋政权即基本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加以阻止。南齐时欲于蜀地采铜铸钱解决钱荒,虽铸得十余万,终因“功费多”而止,所谓功费,主要还是运输艰难。

至于东晋南朝统辖云贵的宁州,与建康间往来水路,大致主要利用乌江、金沙江及其支流进入川江,或由牂柯江转湘江、赣江而达^⑩,至于《宋书·州郡志》所记宁州及宁州各郡至建康的水路具体取道,已难详知,但从所列多达16 000的行程看,上行时困难程度当远甚入蜀。

正因为溯水艰难,处理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陆路则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宋书》卷1《武帝纪上》称刘裕败卢循于建康城下,卢循率水军西走,“公知其必寇江陵,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马军步道援荆州。”同书卷47《檀祗传》亦称:“循退走,祗率所领,步道援江陵,未发,遇疾停。”又同书卷87《萧惠开传》说:刘宋中期,益州刺史萧惠开为政残暴,激起民变,围困成都,“时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险远,赦其诛责,遣惠开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及城围得解,复“遣惠开宗人宝首水路慰劳益州”,轻行“宣朝旨”以解燃眉之急,则由“步道”;事平慰劳,须携礼币,则循水路。可知从建康入蜀陆路快于水路,而要携带沉重的行李,则水路虽慢而为本。

2. 跨地区陆路交通的缓慢发展

与利用自然水道进行水路交通相比,南方陆上交通的发展更能反映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湘江流域、两广地区基本上没有至建康陆路交通的记录,表明这些地区行政机构还基本上沿海、沿江而设,山地开发的水平还非常有限。与此相对应的是,江浙水乡水行更便,却均有陆路相通,赣江流域与湘江流域地理特征相近,但赣江流域各郡多有至州、至京都的陆上交通,这与六朝时期赣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湘江流域不无关系。从相关史实我们知道,六朝后期,皖南及闽浙赣山地,业已形成较为便利的跨地区的陆上交通线。

《三国志》卷48《孙皓传》:天纪三年(277),郭马于广州发动叛乱,孙皓命滕循为率众万人,“从东道讨马”,与郭马将王族在始兴(今广东韶关)遭遇。这是“东道”第一次见于六朝史籍,证以东晋南朝史实,可知所谓“东道”又可称为“岭道”、“峤道”,是一条联系闽浙赣及岭南的重要道路。

东晋末,卢循从广州起兵沿赣江、湘江两路南下,以水军进攻建康,失败后,卢循“于左里奔走,而众力犹盛,自岭道还袭广州”^⑪。左里地在建康附近,卢循经由“岭道”从建康奔广州,庾悦奉命为江州刺史率兵追击,其前锋虞丘进“统马步十八队,于东道出鄱阳,至五亩峤。循遣将英纠为上饶令,千余人守故城,(虞丘)进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为鄱阳太守,据郡,进从余干步道趣鄱阳,敏之退走,追破之,斩首数百。”^⑫这一史实说明,始于建康的这条“东道”或“岭道”,在今江西境内,要通过今天同名的上饶与余干两地。《宋书》卷1《武帝纪上》则记此

事说：“江州刺史庾悦至五亩桥，贼遣千余人据断桥道，悦前驱鄱阳太守虞丘进攻破之。”则这条道路亦称为“桥道”，岭、桥相通，桥道、岭道都是说这条道路翻山越岭。陈朝时，陆山才以监江州事的身份镇守豫章，俘获叛将，“自鄱阳之乐安岭东道送于京师”，“复由乐安岭绥抚南川诸郡”^⑧。乐安当今江西婺源。刘宋中期，臧质于江州起兵反，颜师伯被建康朝廷任命为宁远将军，东阳太守，“领兵置佐，以备东道”^⑨。则今浙江金华亦为“东道”所经之地。从鄱阳出发，经金华则可达于宁绍平原、太湖流域，宋明帝时，江州刺史刘子勋反，“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桥道入三吴，台军主沈思仁与伪龙骧将军任皇、镇西参军刘越绪各据险相守”^⑩。据《宋书》卷84《孔觐传孔琪附传》刘越绪据险相守之地为定阳县，即今浙江江山县。梁末，萧大连为东扬州刺史，驻会稽，侯景之乱，“趣东阳之信安岭，欲之鄱阳”^⑪。信安为今浙江衢州。总之，这条始于今江西波阳的岭道，经今江西余干、上饶及浙江江山、衢州、金华可达达三吴，经江西婺源而入皖南，可通建康。东晋末江州刺史的刘毅“表求东道还京辞墓”^⑫，不走至建康1900里的水程，而行江州治所至建康2100里的陆路，可知这条道路东晋末已畅通无阻。陈朝时，东阳豪族留异与荆州活动的王琳相勾结，对抗陈朝。陈文帝指责他说：“别引南川之岭路，专为东道之主人，结附凶渠，唯欣祸乱。”“南川”为赣江的别称，这条“岭路”之所以被称为“东道”，乃因为可以直通三吴，而三吴大致在建康之东之故。陈初，“王琳据有中流，自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⑬。王琳兵据江州，欧阳颢时任广州刺史，其使人从“东岭”自建康，即从始兴南下，循“东道”“岭路”以达^⑭，可以说，“东道”亦是沟通今广东、福建的重要道路。

南朝时，由今浙江、江西通往福建的陆路也有所发展。《宋书·州郡志二》称江州建安郡（治今福建建瓯）与江州及建康之间有水路相通，但“并无陆”。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市）亦只有水程记录。当时地处福建的这两个郡，还没有较为通畅的陆路通往今南昌及南京是可以肯定的，或者说当时这两个郡要到州治和建康，还只能利用自然河道断续行进。梁末陈初，情况已大有改变。临川（治今江西南城）豪族周迪受到陈朝进攻，“脱身逾岭之晋安，依于陈宝应。宝应以兵资迪，……复越东兴岭，东兴、南城、永成县民，皆迪故人，复共应之。世祖遣都督章昭达征迪，迪又散于山谷。”“昭达仍度岭，顿于建安，与陈宝应相抗，迪复收合出东兴。”^⑮东兴、永成二县均在今江西黎川境，周迪与章昭达率军所穿越的东兴岭即武夷山脉一段，章昭达于临川败周迪，越岭而屯建安，军行无碍，表明江西、福建之间陆路已通。陈初，晋安豪族陈宝应效忠陈朝，“时东西岭路，寇贼拥隔，宝应自海道趋于会稽贡献”^⑯。则其时由晋安赴建康不仅可以利用海道，还有“东西岭路”可通，而且是至建康优先选择的道路。

陈朝时，湘州刺史华皎反，朝廷的讨伐计划为：“是时虑皎先发，乃前遣明彻率众三万，乘金翅直趋郢州，又遣抚军大将军淳于量率众五万，乘大舰以继之，又令假节、冠武将军杨文通别从安成步道出茶陵，又令巴山太守黄法慧别从宜阳出沔陵，往掩袭，出其不意，并与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等参谋讨贼”^⑰；“以中军大将军、司空徐度进号车骑将军，总督京邑众军，步道袭湘州。”^⑱《陈书》卷12《徐度传》说他“自安成郡由岭路出于湘东，以袭湘州，尽获其所留军人家口以归。”主攻方向为溯江而上的水军，步军从建康出发，应沿上述“东道”至鄱阳，进入赣东，从今江西安福、宜春穿越罗霄山脉中的“岭路”，至湖南茶陵、醴陵，“步道”进攻长沙，这既表明其间陆路已通，而步兵作为奇兵，可以“出其不意”，说明当时湘赣间的陆路交通还相当困难，所以华皎疏于防范。

《州郡志》未记录益州及益州各郡至建康的陆程,但从前述刘宋中期遣萧惠基“步道使蜀”事,知从建康入蜀陆路比水路更为便捷。田余庆先生在《东三郡与蜀魏历史》一文中^②,通过对汉末西城(即六朝魏兴,治今陕西安康)、上庸(治今湖北竹山)、房陵(治今湖北房县)三郡历史地理的考察,指出这三地汉代大部分时期属于益州刺史部汉中郡属县,东汉末升格为郡仍属益州,诸葛亮《隆中对》中向刘备所进“跨有荆益”之策,最初的实际意义即从当时治于襄阳的荆州,进取此三郡。田先生细致入微的分析,实际上提示了六朝通蜀的陆路取向。

据《州郡志三》,刘宋时,魏兴、新城(即汉代上庸)、房陵三郡隶属于治汉中的梁州,并有水路通京城建康,而州治通建康的水陆路程并缺。从魏兴亦有水路通州治。可知六朝时汉中、建康间的水路虽行程艰难,但确实存在^③。《州郡志三》记上庸“去州陆二千三百”,新城“去州陆一千五百”,而未记魏兴去州的陆程,但魏兴距汉中更近便,没理由无陆道相通,很可能是《州郡志》失载。

《州郡志三》未记梁州及魏兴等三郡与建康间的陆程,但从其他史实可知,汉中、建康间确有陆路,与水路一样,襄阳仍是这条陆路上的重要中转地。东晋前期,庾翼上书朝廷请求经略襄阳即说:“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④《南齐书》卷51《崔慧景传》称:“建元元年(479),……以慧景为持节、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军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将军如故。敕荆州资给发遣,配以实甲千人,步道从襄阳之镇。”《梁书》卷17《王珍国传》亦称:“(梁天监)五年(506)……出为使持节、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南秦梁二州刺史。会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州降魏,珍国步道出魏兴,将袭之,不果,遂留镇焉。”《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说:元嘉十年,萧承之随梁州刺史萧思话赴任汉中太守,“氏帅杨难当寇汉川,梁州刺史甄法护弃城走,思话至襄阳不进,皇考轻军前行,攻氏伪魏兴太守薛健于黄金山,克之。黄金山,张鲁旧戍,南接汉川,北枕驿道,险固之极。健既溃散,皇考(承之)即据之。……连战皆捷,梁州平”。魏兴郡所在的黄金山为驿路要冲,而驿道的起点,自然是建康。齐初崔慧景、梁初王珍国出镇汉中,均从取从襄阳取“步道”而往,二人所以不行水路,是因为发生北魏进挠汉中的特殊情况,陆路行进速度较快,史传特别说明二人所走为“步道”,反证当时从襄阳至汉中水路为常道。

《州郡志三》记晋寿(治今四川广元)去梁州治所陆程1400里,而《魏书》卷65《邢峦传》亦称“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巴西治今四川绵阳市,南郑即汉中,虽路程“迢递”,往来无碍,由汉中入蜀,陆道较为通畅。当汉中为北方所据,由建康入蜀之陆路遂断。前述梁初王珍国出镇汉中,因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州降魏”,只得留镇魏兴。梁失汉中,便失去一条通往益州的快速通道,这便是邢峦上表北魏朝廷,所称“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唯资水路”,可借机图取全蜀的背景。

3. 六朝时代海道的利用及局限

六朝立国南方,长期跨有黄海、东海、南海,边海之地甚多,与两汉相比,海道对于六朝财富运输与政治控辖具有重要的意义。孙权利用海道扩张势力,“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并抵达今台湾,又曾“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浮海至辽东^⑤。为治史者所习知。

从史实上看,六朝海路使用较两汉有所发展,但六朝从建康至交、广,所取道路主要还是

溯江经赣江、湘江以达,或循前述“东道”越岭,走海路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

吴建衡元年(269)派军与西晋争夺交趾,“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汜、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勣、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结果“李勣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⑧,李勣走海道并未成功。而陶璜等则从荆州至合浦,“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趾”^⑨。步骘从鄱阳太守任上改任交州刺史,“便道南行”,离任时,“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⑩。他轻行赴任时所走“便道”,当即溯赣江南下逾岭,当其率众而还,道经长沙,表明经湘江越岭往来,是孙吴时建康与交趾间交通的常道,亦即陶璜率众前往交趾之道。需要说明的是,陶璜从合浦即今广西合浦“从海道”出兵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乃“出其不意”,并非正途。如《三国志》卷49《士燮传》及卷52《步骘传》所记史实表明,交趾与今两广经常使用的道路还是陆道。《后汉书》卷33《郑弘传》称郑弘于东汉章帝时任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唐李贤注“至今为常路”之“今”说:“今谓范曄时也。”至刘宋时,零、桂峤道仍为建康与交趾间的“常路”,则海路使用有限断然可知。

六朝时一些有关利用海道的史实,常被用作海道畅通的证据,事实并非如此。东晋前期,“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⑪。东土即会稽等地,这里的百姓规避赋役逃往广州,自然不可能选择更为快捷但有官司巡检的“东道”,只能赴海以卜生死。东晋末,孙恩于会稽以道教合众起兵,被朝廷搜捕追击,不得已浮海抄掠,其余部后在卢循的带领下从永嘉(今浙江温州)海道“泛海到番禺,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亦是“窘急”情况下的行为^⑫。后卢循于广州起兵,并未从海道还至三吴,利用道教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南康山中聚材造船,沿赣江而下直取建康。及卢循败还广州,刘裕“遣(孙)季高率众三千,泛海袭番禺。初,贼不以海道为防,季高至东冲,去城十余里,城内犹未知。循守战士犹有数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舰,悉力登岸,会天大雾,四面陵城,即日克拔”^⑬。《宋书》卷1《武帝纪上》说:“初,公之遣季高也,众咸以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且分散见力,二三非要。公不从。敕季高曰:‘大军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虏。卿今时当至广州,倾其巢窟,令贼奔走之日,无所归投。’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克捷。”陈初,晋安(治今福建福州市)陈宝应因“东西岭路”受阻,才“自海道趋于会稽贡献”;广州刺史欧阳颢因王琳阻断长江,方“自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均已见前述。陈宝应地处沿海,习于海路,于梁末动乱中“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货产,士众强盛。”^⑭仍将“东西岭路”作为通向建康的最佳道路。后陈朝遣章昭达率军越东兴岭经建安进攻晋安,命“余孝顷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余孝顷所走即为海道,与东晋末孙处攻广州一样,仍是出其不意的偷袭行为^⑮。

六朝至交、广,海路非正途,那么《宋书·州郡四》所记交州、广州及其治下各郡通往建康的水路,便不可能是海程,而是内陆间断水道相加的结果,至于交广各地何者至始兴下赣江,何者通过灵渠下湘江,从而得到《州郡志四》所记水程,则难遽断^⑯。广州与建康间,通过始兴(韶关)以远一段岭路联络赣江与珠江支流形成水道^⑰,应是广州“去京都水五千二百”的依据。

正因交、广至建康海道不畅,内陆水路不能直达,六朝海外贸易虽日益繁荣,东南亚商船

从地理上看可直达建康,确亦有东南亚海船进至建康,乃至溯江而至江陵的史实,但对外贸易的主要地点还是广州、日南、交趾,并非建康这一奢侈品需求量最多的政治中心。

注 释:

- ① 东晋南朝“乘驿”、“驰驿”的事例甚多,应有相当完整的驿路系统。《宋书》卷 65《申恬传》称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南进,攻东阳城不下,“东过抄略清河郡及驿道南数千家,从东安、东莞出下邳。”同书卷 77《柳元景传》说,柳元景为随郡太守,“蛮断驿道,欲来攻郡。郡内少粮,器仗又乏,元景设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驿道。”亦证六朝“驿道”的存在。
- ② 《宋书·志序》说:“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
- ③ 如《州郡志二》“江州·安成郡”说:“去州水三千三百,陆三千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七百,无陆。”安成治今江西安福,其至建康水路当沿今赣江支流泸水下赣江,再沿赣江至州治即今江西南昌市,再沿赣江至长江而达建康。但志称江州“去京都水一千四百”,则安成郡去京都水路应为四千七百之误。
- ④ 如仍以军事行动为例,骑马轻装疾行一日一夜可行 300 里。见《三国志》卷 32 所记曹操追击刘备事。
- ⑤ 《陈书》卷 1《武帝纪》。《水经注》卷 39《赣水注》说:“豫章水导源东北流,迳南野县北。赣川石阻,水急行难,倾波委注,六十余里。”南野为今南康市。
- ⑥ 《水经注·赣水注》说:“(庐)山庙甚神,能分风擘流,住舟遣行,过必敬祀而后得去。”庙神乃因行路之难。《搜神记》卷 4“张璞”条说(万有文库本):“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祀,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视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同卷“青洪君”条说:“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中,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
- ⑦ 《宋书》卷 48《朱龄石传》:“九年,遣诸军伐蜀,令龄石为元帅,以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率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龙骧将军朱林等,凡二万人,发自江陵。寻加节益州诸军事。初,高祖与龄石密谋进取,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堕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书,全封付龄石,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所由。至白帝,发书,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
- ⑧ 《州郡志四》记建康与成都之间水程为 9970 里。当以“外水”入蜀水程为准。
- ⑨ 《魏书》卷 65《邢峦传》载,北魏宣武帝初,邢峦上表图蜀,首称:“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唯资水路。萧衍兄子渊藻,去年四月十三日发扬州,今岁四月四日至蜀。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
- ⑩ 《州郡志四》记宁州绝大部分郡都与水路至建康。秦汉以蜀郡为中心开“西南夷”,自然会影响到云贵地区道路取向的选择,诸葛亮征“南中”,“渡泸”而往,世所习知;《宋书》卷 52《袁湛传》袁豹附传称

东晋末朱龄石入蜀伐割据者谯纵,袁豹为作檄文,列数入蜀诸军,谓“振威将军朱客子,提宁州之锐,渡泸而入”。泸水即金沙江。《汉书》卷 95《西南夷传》称汉使唐蒙至夜郎,知从夜郎“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及汉伐南越,唐蒙献策:“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汉时已通之水路,在重水路的六朝时期当亦沿用。

- ⑪ 《宋书》卷 49《孙处传》。
- ⑫ 《宋书》卷 49《虞丘进传》。
- ⑬ 《陈书》卷 18《陆山才传》。
- ⑭ 《宋书》卷 77《颜师伯传》。
- ⑮ 《南齐书》卷 1《高帝纪上》。
- ⑯ 《陈书》卷 35《留异传》。
- ⑰ 《宋书》卷 50《胡藩传》。
- ⑱ 《陈书》卷 9《欧阳颢传》。
- ⑲ 案:“东岭”即“东道”、“岭路”之合称,而非专指一地,还有其他史实可资证明。《陈书》卷 18《袁泌传》:“京城陷,退保东阳,景使兵追之,乃自会稽东岭出淦城,依于鄱阳嗣王萧范。”同书卷 21《王固传》:“荆州陷,固之鄱阳,随兄质度东岭,居信安县。”
- ⑳ 《陈书》卷 35《周迪传》。
- ㉑ 《陈书》卷 35《陈宝应传》。
- ㉒ 《陈书》卷 20《华皎传》。
- ㉓ 《陈书》卷 12《徐度传》。
- ㉔ 收于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 1993 版。
- ㉕ 《三国志》卷 44《蒋琬传》:“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田余庆先生曾引以说明三国时三郡道路交通情形,东晋南朝当亦如此。
- ㉖ 《晋书》卷 73《庾亮传庾翼附传》。
- ㉗ 《三国志》卷 47《孙权传》。
- ㉘ 《三国志》卷 48《孙皓传》。
- ㉙ 《晋书》卷 57《陶璜传》。
- ㉚ 《三国志》卷 52《步骘传》。
- ㉛ 《晋书》卷 73《庾亮传庾翼附传》。
- ㉜ 《晋书》卷 100《孙恩传》、《卢循传》。
- ㉝ 《宋书》卷 49《孙处传》。
- ㉞ 《陈书》卷 35《陈宝应传》。
- ㉟ 《陈书》卷 10《程灵洗传程文季附传》、卷 18《陆山才传》均称:“余孝顷自海道袭晋安。”
- ㊱ 《汉书》卷 6《武帝纪》记汉武帝元五年出兵击南越,“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浞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汉时大军出征水路,六朝仍当沿用。
- ㊲ 《宋书》卷 49《孙处传》称孙处自海道袭取广州,“循父嘏、长史孙建之、司马虞彪夫等,轻舟奔始兴。”证明从广州水行可直达始兴。